

唐代後期的印刷

李 書 華

唐代前期中國似已有印刷術。西元八世紀下半期，日本有百萬塔陀羅尼經的刊印，其刊印方法當係由中國輸入日本⁽¹⁾。到了唐代後期，不但文獻中有不少關於印刷的記載，而且敦煌發現了雕印的金剛經與日曆，成都出土了雕印的陀羅尼經。文獻記載與實物發現，均證明唐代後期的印刷已相當發展。

茲將唐代後期的印刷分別敘述於後：

(一) 唐馮宿奏准禁印曆日版(西元835)

冊府元龜：

[唐文宗太和]九年(西元835)十二月丁丑，東川節度使馮宿(767-837)奏准勅禁斷印曆日版。劍南兩川及淮南道，皆以版印曆日鬻於市；每歲司天臺未奏頒下新曆，其印曆已滿天下，有乖敬授之道；故命禁之⁽²⁾。

上述馮宿奏文一段，被收入於欽定全唐文，題為“[馮宿]禁版印時憲書奏”⁽³⁾。

按舊唐書(卷168)及新唐書(卷177)，均有“馮宿傳”。清王昶金石萃編有“馮宿碑”，為王起撰，柳公權書⁽⁴⁾。惜“碑後文磨蝕垂盡”，“漫漶不可認”，“今獨前文尚可辨”。

照“馮宿傳”及“馮宿碑”文所記，馮宿年二十六舉進士，陸贄門人，太和九年出為劍南東川節度使，開成元年(西元837)十二月三日，享年七十，薨於位。

“馮宿傳”及碑文中可辨認的部分，均未記載“禁印曆日版”事；碑文中不可辨認的部分是否記載此事，自無法得知。然舊唐書(卷17下)“文宗本紀”：

“[太和九年十二月]丁丑勅諸道府不得私置曆日版”。這個記載，雖不如冊府元龜之詳細，然可互相印證。

按唐時劍南兩川，分為：劍南西川治成都，約當今四川西部；與劍南東川治梓州，約當今四川東部；淮南道治揚州，約當今江北的江蘇安徽一帶。

照冊府元龜所記原文看來，西元九世紀上半期四川及長江下游一帶版印曆日甚盛；且“印曆已滿天下”，可見出售印曆已普遍全國。

又宋王諱（徽宗時人）唐語林：

僖宗入蜀，太史曆本不及江東，而市有印貨者，每差五朔晦，貨者各徵節候，因爭執，里人拘而送公。執政曰：“爾非爭月之大小盡乎？同行經紀，一日半日，殊是小道。”遂叱去。而不知陰陽之曆，吉凶是擇，所誤於衆者多矣⁽⁵⁾。

既稱“每差五朔晦”，可見唐僖宗時江東有不同的各種印本曆書。因“各徵節候”而發生“爭執”，亦可知一般人民用曆書的普遍。

（二）唐乾干泉雕印劉弘傳（847-849）

唐范攄雲溪友議：

乾干尚書泉，苦求龍虎之丹十五餘稔，及鎮江右，乃大延方術之士作劉弘傳，雕印數千本，以寄中朝及四海精心燒鍊之者⁽⁶⁾。

雲溪友議一書，新唐書（第49）藝文志著錄三卷。范攄始末不詳，藝文志註稱咸通時（806-847）人，自稱五雲溪人，其書即以此命名。書中所錄為中唐以後雜事。范攄自作雲溪友議序，被收入於全唐文中⁽⁷⁾。

乾干乃是一個稀有的姓氏，伯希和（P. Pelliot 1878-1945）遺著⁽⁸⁾指出此姓氏起源於蒙古東部“Organ？”，元魏時代即有之，後周及唐代均有此姓氏的代表人物。

清勞格（1820-1864）及趙鐵著唐尚書省郎官石柱題名考載：石柱題名者有乾干泉。該書彙集乾干泉有關的記載十餘種，其中列有雲溪友議。此十餘種記載中，間有列乾干泉，乾干洎，乾干衆者，該書均注明為乾干泉之誤⁽⁹⁾。

新唐書（第49）藝文志載有“乾干泉序通解錄一卷”，註稱：“字咸一，大中（847-859）中江西觀察使”。

南宋鄧名世古今姓氏書辨證(卷37)“紇干”條內列二人：一為唐御史大夫紇干遂；一為江西觀察使紇干象，謂為望出雁門。

照舊唐書(卷177)及新唐書(卷182)所記，紇干象與裴休(786-860)素善，皆以桑門號相字；而雲溪友議所記，則紇干象苦求龍虎之丹，大延方術之士作劉弘傳；似紇干象乃信奉佛道兩教者。

西元1926年桑原鷲藏(Kuwabara Jitsurō)評“卡特印刷起源於支那”文中，考證雕印劉弘傳的年代。照雲溪友議記載，劉弘傳乃紇干象鎮江右時所雕印。江右即當時之江南西道，簡稱江西，相當於今之江西至湖南一帶。為考證紇干象任江西觀察使年代，桑原鷲藏特查江西通志，再將該通志的記載與唐書互證，推測出紇干象雕印劉弘傳約在西元847與848年之間⁽¹⁰⁾。

按江西通志“職官表”所列江西觀察使：紇干象之前為周墀，紇干象之後為周敬復。該“職官表”載明：周墀洪州刺史，江南西道觀察使，會昌六年(西元846)任；紇干象雁門人，舊志作紇干象，江南西道觀察使，大中時任；周敬復兼洪州刺史，江南西道團練觀察使，大中四年(850)任⁽¹¹⁾。又舊唐書(卷18下)“宣宗本紀”載：周墀於會昌六年(846)十一月(陰曆十一月初一即陽曆十一月二十三日)由江西觀察使轉義成軍節度使；周敬復於大中四年十二月(西元851年一月)轉江南西道團練觀察使。如是則紇干象任江西觀察使時期，應為西元846年十一月至851年一月；這也就是伯希和遺著所說的期間。

又吳廷燮歷代方鎮表載：江西觀察使：周墀會昌四年至六年，紇干象大中元年至三年，裴儔大中三年至四年，周敬復大中四年至七年⁽¹²⁾。如是紇干象任江西觀察使為西元847至849年。

吾人姑認為吳廷燮所述的年代正確，則紇干象雕印劉弘傳應在西元847與849年之間。

雲溪友議原記載前幾句話：“苦求龍虎之丹十五餘稔，及鎮江右，乃大延方術之士作劉弘傳……”的語氣，似顯示紇干象作劉弘傳及雕印該傳的急切。大概因此桑原鷲藏相信雕印劉弘傳應在紇干象任江西觀察使的初年。這或者是他推測該傳的

雕印，約在西元 847 與 848 年之間的原故。吾人以為雕印的期間，仍應採用 847 與 849 年之間。

向達“唐代刊書考”：

唐武宗時道教大盛，廢天下僧寺，一時士大夫趨赴風尚，俱舍而學道。會昌六年(西元 846)四月道士趙歸真伏誅，道教遂衰。宣宗大中元年(西元 847)修復廢寺。則紇干……鎮江右，當在趙歸真尚未伏誅以前；中朝士大夫不少言修鍊之術者，用敢雕印劉弘傳數千本以寄之也。故紇干之雕印劉弘傳，當在會昌(841-846)之時⁽¹³⁾。

向達以為紇干鎮江右，當在趙歸真尚未伏誅以前，這是向達推測之詞，與江西通志，歷代方鎮表，及舊唐書所載不符。考唐武宗好神仙，道士趙歸真得幸；武宗又惡僧尼耗蠹天下，趙歸真等復勸之，于是寺非應留者，立期令所在毀撤。會昌五年(845)八月詔陳釋教之弊，凡天下所毀寺四千六百餘區，歸俗僧尼二十六萬五百人。會昌六年(846)正月武宗崩，宣宗即位；四月杖殺趙歸真等數人；除以前所留少數寺外，復增置僧寺。大中元年(847)君相務反會昌之政，僧尼皆復舊。但趙歸真死後，朝廷對於道教，似仍頗推崇，例如會昌六年十月“上(即宣宗)受三洞法籙於衡山道士劉玄靜”，即其明證。雕印劉弘傳，恰在會昌之後。是時皇帝尚受法籙於道士，則紇干自無不敢雕印劉弘傳之理。

總之既然紇干在江西一次雕印劉弘傳至數千本之多，可知當時江西雕板印刷之盛。

(三) 日本僧宗叡(Shūyei)撰“新書寫請來法門等目錄”(西元 865)

都利聿斯經一部五卷；

七曜禳災法一卷；

七曜二十八宿曆一卷；

六壬名例成歌一部二卷；

明鏡聯珠一部十卷；

秘錄藥方一部六卷，兩策子；

削繁加要書儀一卷，元和年中者；

西川印子唐韻一部五卷；

同印子玉篇一部三十卷。

右雜書等雖非法門世者所要也。大唐咸通六年（西元865）從六月迄於十月，於長安城右街西明寺日本留學僧圓載法師院求寫雜法門等目錄具如右也。日本貞觀七年（865）十一月十二日却來左京東寺重勘定。入唐請益僧大法師位為後記之⁽¹⁴⁾。

向達“唐代刊書考”指出最先發現此段文獻者，為日本禿氏祐祥著古代版畫集後附“版畫考”一文。宗叡為唐代日本僧入唐八家之一，於唐咸通三年（西元862）到中國留學；咸通六年（865）返回日本時攜去經卷凡一百四十三卷；經卷之外，復攜去西川印子唐韻及玉篇雜書。

“印子”本即印本或刊本。上列目錄中之唐刻本唐韻五卷，玉篇三十卷，現均不存，然亦可想像當時四川印書之盛。

（四）唐司空圖化莫雕刻律疏（871-879）

唐司空表聖文集又名一鳴集（卷第九）：

為東都敬愛寺講律僧惠確化莫雕刻律疏：“……自洛城罔遇，時交乃焚，印本漸虞散失，欲更雕鏤，惠確無愧專精，頗嘗講授，遠欽信士，擔結良緣，所希龜鏡屯□，津梁靡絕，再定不刊之典，永資善誘之方，必期字字鐫銘，種慧牙而不竭，生生親眷，遇勝會而同聞，敢期福報之微，願允標題之請，謹疏”。

注稱：“莫募通，印本八百紙”。

按舊唐書（卷190下）“司空圖傳”：司空圖字表聖，本臨淄人。咸通十年（西元869）登進士第；後召拜殿中侍御史，以赴闕遲留責授光祿主簿，分司東都（即洛陽）。乾符六年（879）宰相盧攜罷免，司空圖與之遊。明年（880）陝帥盧渥奏為賓佐。天祐元年（904）昭宗遷洛後，柳璨希朱全忠旨陷害舊族；召入朝，力疾至洛陽；謁見之日，墮笏失儀，旨趣極野尋放還山。唐祚亡之明年（908）卒，時年七十

二。

司空表聖文集又名一鳴集，收入欽定全唐文(卷808)，結一廬朱氏騰餘叢書(光緒乙巳刊)，及四部叢刊(初編，集部)等書中。上列“化募雕刻律疏”中一段，係錄自四部叢刊本，其中定有錯字。全唐文作“時交乃楚”，“楚”字當係“焚”字之誤。四部叢刊作“遠欽信士，擔結良緣”，全唐文及結一廬叢書均作“誓給良緣”；“擔結”二字，當係“誓給”之誤。四部叢刊作“龜鏡屯□”，全唐文及結一廬叢書均作龜鏡益昭；“益昭”二字應替代“屯□”。四部叢刊及結一廬叢書均作“種慧牙而不潔”，全唐文則作“種慧良而不潔”。至全唐文與結一廬叢書均作“敢欺福報之微”，“敢欺”二字自係“敢期”之誤。

清王士禎(1634-1711)居易錄：

予按司空表聖一鳴集，有為東都敬愛寺募雕刻律疏印本疏云：“自洛城□□乃焚，印本漸虞散失，欲更雕鏤”云云，則唐已刻書；此其昭昭可據者，顧前人無引之者何也？⁽¹⁵⁾。

王士禎據司空圖的文章，認為“唐已刻書”，大概是注意這個問題的第一個人。

清阮葵生(1772-1789)茶餘客話，謂“司空表聖一鳴集為東都敬愛寺募雕刻律疏”：

“自洛城焚，印本漸虞散失，欲更雕鏤”⁽¹⁶⁾。阮葵生的記載，幾與王士禎居易錄相同。

葉德輝書林清話亦提到司空圖的化募文⁽¹⁷⁾。

桑原鶯藏“評卡特印刷起源於支那”文中，引用司空圖化募文，且為之斷句如下：“自洛城周遇時交。乃焚印本。漸虞散失。欲更雕鏤。……”桑原鶯藏並略稱：司空圖勸化文所作年代不明，屬於九世紀後半期，大致無疑；然以前洛陽名利敬愛寺所藏印本燒失，募化再印資金，不知燒失係何年？因桑原鶯藏斷句有誤，故有敬愛寺所藏印本燒失的結論。

向達“唐代刊書考”進而考證司空圖募化雕刻律疏一文的年代：向達假定此文是司空圖作於居洛陽之時，他指出司空圖生平入洛前後兩次：第一次在咸通末年及

乾符六年之間（約在西元871-879），司空圖分司東都；第二次在天祐二年昭宗遷洛後，司空圖被召力疾至洛陽；這全是根據舊唐書“司空圖傳”。向達認為此文當作於第一次入洛之時。他引申說：

若第二次則史稱其謁見之日，墮笏失儀，旨趣極野，尚何逸致作此閒文？即令作於此時，文中“洛陽罔遇”之詞，必不敢形諸筆墨以賈禍也。……所云“自洛城罔遇，時文乃焚”以下四語，其為特指會昌毀佛之事而言。

按毀佛之事為會昌五年（西元845）。照向達的考證，敬愛寺律疏原印本，當係西元845年以前所雕印者，而且在西元845年以前該寺已藏有原印本了。那次的募化，只是要重印而已。

向達的這種結論，似屬正確。如是則司空圖作文的年代，應為西元871與879年之間。

向達自注稱：“某君於此數語斷句作為：‘自洛城罔遇時文。乃焚印本。漸虞散失。欲更雕鏤。’夫印本既焚，已歸散失，尚何漸虞之有乎。”向達此注，大約係暗指桑原鷺藏斷句之誤。

伯希和遺著將司空圖化募雕刻律疏文譯成法文；他指出阮葵生是對於此文中有關印刷問題引起人注意的第一個人；實在王士禎注意這個問題，遠在阮葵生以前。伯希和的斷句是採用桑原鷺藏的辦法，但伯氏却注意到阮葵生的撮要，“焚”字應與洛城相連，就是斷句應為“自洛城焚”。

1955年富路特（L. Carrington Goodrich）重編卡特所著中國印刷術源流史，似仍根據桑原鷺藏斷句及其結論，所以有“每部八百紙的印本律疏在洛陽亂時被焚”⁽¹⁸⁾之語，亦係誤解司空圖化募文的原意。

司空圖化募文證明唐代在西元八百七十幾年時洛陽已有雕板印刷，而且能印每本共八百紙的厚書。

（五）唐柳玼訓序中印板書（西元883）

宋葉真愛日齋叢鈔引柳氏（柳玼）家訓序：

中和三年（西元883）癸卯夏，鸞輿在蜀之三年也。余為中書舍人，旬休閱書

於重城之東南；其書多陰陽雜說占夢相宅九宮五緯之流，又有字書小學，率雕板印紙，浸染不可盡曉⁽¹⁹⁾。

按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卷118）略稱：愛日齋叢鈔五卷，散見於永樂大典共一百四十三條，見於陶宗儀說郛（第17卷）二十二條，其說郛有而永樂大典脫去者十條，取以參補實得一百五十三條。書中大旨主於辨析名物，稽考典故。永樂大典未題撰人姓名；說郛則題為宋葉某所撰而不著其名。其論先儒從祀一條（叢鈔卷二）有宋度宗咸淳年號，應為宋末人所作。

清黃虞稷（1629-1691）千頃堂書目載有：宋葉真愛日齋叢鈔十卷⁽²⁰⁾；伯希和遺著，指出此點，且認為叢鈔撰人為葉真決無疑問，吾人亦相信伯氏的說法正確。

舊唐書（卷165）及新唐書（卷163）均有“柳玘傳”。資治通鑑亦有關於柳玘的記載。柳玘乃柳公綽之孫，柳公權之侄孫，柳仲郢之子。乾符六年（西元879）黃巢陷文廣，時柳玘任節度副使，逃還，除起居郎。廣明元年（880）黃巢入長安，時僖宗已出走，柳玘奔行在，再遷中書舍人，御史中丞。文德元年（888）柳玘以吏部侍郎修國史，拜御史大夫。嗣以宦者惡之，故久謫於外；景福二年（893）柳玘由渝州刺史轉為瀘州刺史，卒。光化（898-901）初詔復官爵。

新唐書（卷58）藝文志載：柳氏訓序一卷，注：“柳玘”。舊唐書“柳玘傳”載有柳玘嘗著書誡其子弟一文，長約六百餘字；又新唐書“柳玘傳”載有柳玘嘗述家訓以戒子孫一文，長約九百五十餘字；這兩篇文章，均為欽定全唐文（卷816）所收。前者名為柳玘“家訓”，後者名為柳玘“戒子孫”。

柳玘訓序全文已不存。其中關於四川印刷記載，宋葉夢得（1077-1148）石林燕語說：

柳玘訓序言其在蜀時嘗閱書肆云字書小學，率雕板印紙⁽²¹⁾。

石林燕語一書，葉夢得原序謂為建炎二年（西元1128）以後所作，即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卷121）所謂該書成於南渡以後。書中論宰相一條，有“至今紹興六年（1136）”之句，則該書應為西元1136年以後所作。燕語大概是引用柳玘訓序關於印刷一段之最早者，惟所引僅係撮要，並非全段。引用全段最早者，應為愛日齋叢

鈔，這也就是伯希和遺著所指出的。

舊五代史（卷43）將柳玘家訓序關於印刷一段記載全部引入。與愛日齋叢鈔所引相同。

宋代以後引柳玘訓序中關於印刷記載的頗多：元馬端臨文獻通考“經籍考”引葉石林：“柳玘訓序言其在蜀時嘗閱書肆云字書小學率雕板印紙”⁽²²⁾。明陸深（1488-1505）金臺紀聞引柳玘訓序，係轉錄石林燕語撮要文句⁽²³⁾。明胡應麟（1551-1602）少室山房筆叢引柳玘訓序，大致亦與石林燕語文句相同⁽²⁴⁾。清陳元龍格致鏡原引“七脩類藁”：“柳玘訓序又云嘗在蜀書肆中閱印板小學書”⁽²⁵⁾。清張澍蜀典引柳玘序文云：“嘗在蜀時書肆中閱印板小學書”⁽²⁶⁾。葉夢得、馬端臨、陸深、胡應麟、陳元龍及張澍僅述及印板小學字書，或印板小學書，而未將其他雜書列入者，大概是文人只注意與文學有關的印板書而忽視其他雜書的原故。

葉德輝書林清話引柳玘家訓序關於印刷一段全文，復錄石林燕語引柳玘訓序的簡單語句。留庵（孫毓修）中國雕板之原流考（民七出版）採用石林燕語所引柳玘訓序內容，謂：“中和三年在蜀閱書肆所鬻字書，率雕本”。

西方學者述及柳玘訓序最早為米斗（Meadows）。1858年米斗譯述文獻通考所載葉夢得關於印刷的記載，包括柳玘訓序所述在蜀看見的印刷書籍一段在內⁽²⁷⁾。

1919年衛雷（A. Waley）述及柳玘在四川時曾看見印板書。衛雷是從格致鏡原中引柳玘家訓序而得來的⁽²⁸⁾。

1925年卡特中國印刷術源流史⁽²⁹⁾中及以後伯希和遺著中，均提到柳玘訓序。

總之西元883年，柳玘於旬休（唐時十日有一日之休息，與今之星期日休息相似）時在成都重城東南所閱之書，多為印本的陰陽雜說與字書小學等書，則當時此類書籍之雕板印刷，似在四川頗為普遍。

（六）宋朱翌與王應麟的記載

宋朱翌（1097-1167）猗覺寮雜記：

雕印文字，唐以前無之。唐末益州始有墨板，……見兩朝國史⁽³⁰⁾。

宋王應麟（1223-1296）困學紀聞：

國史藝文志：唐末益州始有墨板，多術數字學小書⁽³¹⁾。

王應麟玉海(卷43)：

國史志唐末益州始有墨板，多術數字學小書。

按宋代屢修國史。朱翌所稱“兩朝國史”，或即王珪兩朝國史（仁宗英宗兩朝）。“國史志”乃宋代“國史藝文志”的簡稱。宋代國史“藝文志”著錄者六，未著錄者一。宋代國史，除皇家保存外，私人亦得收藏，然今無一卷存留於世⁽³²⁾。

明張燧千百年眼載：“唐末益州始有墨板，多術數字學小書”⁽³³⁾。明焦竑焦氏筆乘續集，載有同樣文句⁽³⁴⁾。大約全是引用王應麟的記載。清朱彝尊(1629-1709)經義考⁽³⁵⁾及清張澍蜀典，亦各有同樣記載，但朱彝尊註明係引用國史志，張澍註明係引用國史藝文志。

葉德輝書林清話引猗覺寮雜記“唐末益州始有墨版……見兩朝國史”。留庵中國雕板源流考引“國史志唐末益州始有墨版，多術數小學字書”。

卡特中國印刷術源流史提到國史志所述的話。伯希和遺著特別有一章討論“國史志”及“國史志”所載那句話的來源。伯希和說：留庵所引國史志，不知出自何書？他又說張澍及留庵的話的來源不能定；實在張澍所引應出自王應麟的困學紀聞，留庵所引應出自王應麟的玉海。伯希和未曾指出王應麟的這兩部書的記載。至於伯希和以為“兩朝國史”所載的文句，不過是柳玘訓序中所記文句的撮要；而朱翌或“國史志”的記載，亦非另一種獨立的材料；這一層似尚待考證。然無論如何，柳玘訓序與國史志全是記載唐末四川印刷發展的情形。

(七) 敦煌發現唐代印本書

1907年三月斯坦因 (Aurd Stein, 1862-1943) 在敦煌千佛洞(莫高窟)藏書密室中取去佛畫寫本印本卷子約七千件，現藏倫敦大英博物館 (British Museum)。同年十二月伯希和由該地藏書密室中獲得約三千件，現藏巴黎國立圖書館 (Bibliothèque Nationale de Paris)。敦煌寶藏，得聞於中國政府及學人，係由於伯希和至北京之報告。嗣橋瑞超獲得卷子四百餘件。清宣統二年學部咨甘肅有司將遺餘殘卷悉數運京，共卷子八千六百七十九件，後來藏於北平圖書館。巴黎所藏，曾由北平圖書館

全部照像攜回。巴黎倫敦所藏卷子，大部分為寫本，印本甚少。印本中有年代者，倫敦有六種，巴黎有四種，其年代係由西元 868 年至西元 950 年⁽³⁶⁾，係唐代末葉及五代時期之物。

上述十種印本中，刊有唐朝年代者二種；年代雖未刊明，然考證而得知為唐代印本者一種；此三種印本，全在倫敦，均屬唐代末葉之物。現略述於後：

1. 咸通九年刊印金剛經 (西元 868)：

斯坦因所發現印本金剛經 (Diamond Sutrā) 一捲 (roll)，係雕板印成，未有刊印年月一行，文曰：“咸通九年四月十五日王玠為二親敬造普施”。咸通九年為西元 868 年，此為現存刊有年代最古的雕板印本書。全書正文紙張六葉，黏成一長幅，共長約十七英尺半，寬約二十六公分 (cm) 半。紙質普通，近乎白色。首頁為雕板印畫，釋迦佛 (Buddha) 坐於正中蓮花座上，對其老徒弟須菩提 (Subhūti) 長老作講話之狀。長老居右側，右膝著地。雕板印畫後係雕板所印金剛般若波羅密經 (梵文名 Prajna Paramita) 本文，乃鳩摩羅什所譯之文。經首冠以淨口真言，經末亦附真言。雕板印畫及板印文字，俱精細古勁(參看第一圖)，遠比日本百萬塔陀羅尼刊本及古登堡 (Gutenberg) 以前歐洲雕板印本為優良；足證唐代末葉雕板印刷技術進步，並足證當時雕板印刷早已開始很久。

斯坦因西域考古記⁽³⁷⁾，卡特中國印刷術源流史，向達“唐代刊書考”，及小翟理士 (Lionel Giles) 論文⁽³⁸⁾與其許多學者，均咸稱此項雕板印刷技術的精良。

2. 乾符四年印曆 (西元 877 年)：

斯坦因敦煌蒐集品 (The Stein Collection) 中，有不完整的板印日曆一捲，長約三英尺半，寬約二十七公分半。此日曆上印月日節氣 (如六月小，大暑六月中；八月大，秋分等等)，附有乾坤八卦等；並有鼠(子)，牛(丑)，虎(寅)，兔(卯)，龍(辰)，蛇(巳)，馬(午)，羊(未)，猴(申)，鷄(酉)，狗(戌)，猪(亥)等圖。鼠，蛇，猴上註有“吉”字參(看第二圖)。日曆上未載年代，但日曆為丁酉年，且有閏月；又日曆中附有年表，由興元元年 (西元 884) 起至乾符四年 (西元 877) 止。小翟理士由這些線索考訂此日曆為乾符四年印曆⁽³⁹⁾這是世界上現存最古的印本曆書。

3. 中和二年樊賞家曆（西元882年）：

斯坦因敦煌蒐集品中，又有淺黃色紙殘曆一張，僅長二十六公分，寬八公分，係一印曆；印字粗黑 (thick and black)；印刷技術較乾符四年印曆為佳。所刊年代為“中和二年”，標明為：劍南西川成都府樊賞家曆（參看第三圖）。

除上述金剛經及印曆外，北平圖書館所藏唐人寫經“有”字九號金剛經殘本一冊，計十頁，末附“西川過家真印本”字樣，又有“丁卯年三月十二日八十老人手寫流傳”字樣。此處所謂“丁卯年三月十二日”應係唐昭宣帝天祐四年（西元907）三月十二日。是年三月二十七日唐昭宣帝降御札禪位於梁，四月二十二日梁太祖改開平元年。此金剛經殘本係一位八十四歲老人依照過家印本重抄者，其印本自係天祐四年三月十二日以前的唐印本。

（八）成都卞家印陀羅尼經

1953年成都東門外望江樓附近唐墓出土的龍池坊卞家所印陀羅尼經，約一尺見方；大部分為梵文，中間與四周各有小佛像。第一行有“成都府成都縣龍池坊卞家印賣咒本”字樣⁽⁴⁰⁾。應為國內現存最古的印刷品（參看第四圖）。

結 論

由以上各種記載及實物看來，唐代後期的印刷，特別是西元九世紀的印刷，已頗發達，雕印書籍及其他印刷品很多。就印本可考者而論，有曆書、唐韻、玉篇、字書、小學、佛教的金剛經、陀羅尼經、化莫雕刻律疏、還有與道教有關係的劉弘傳及陰陽雜說占夢相宅九宮五緯之流，範圍甚廣；地域包括今四川、江蘇、安徽、江西、湖南、河南等處；可以推知當時印刷頗為盛行。由此遂漸漸走向後來印刷全盛時代。

註

- (1) 李書華，“印刷發明的時期問題”，大陸雜誌，第17卷第5期，民47年9月。
- (2) 冊府元龜，卷160。

- (3) 欽定全唐文，卷624，嘉慶19年編，光緒辛丑廣雅書局刊。
- (4) 清王昶，金石萃編，卷113，唐73。
- (5) 宋王謙唐語林，卷7，補遺，叢書集成，第2759冊。
- (6) 唐范攄雲溪友議(共三卷)，下，“羨門遠”，四部叢刊續編子部。
- (7) 同上註(3)，卷804。
- (8) Paul Pelliot, *Les Débuts de l'Imprimerie en Chine*, Paris, 1953.
- (9) 清勞格趙鐵著，唐尚書省郎官石柱題名考(共26卷)，卷7，月河精舍叢鈔，光緒四年(1878)丁寶書輯。
- (10) 桑原鷺藏“評卡特印刷起源於支那”，史林(Shirin), Vol. 11, 大正15年(1926)，頁112-132。
- (11) 江西通志，卷8，“職官表”，光緒6年(1880)刊。
- (12) 吳廷燮歷代方鎮表，唐方鎮年表五，“江西”。
- (13) 向達“唐代刊書考”，中央大學國學圖書館第一年刊，民17，頁1-19。
- (14) 大正新脩大藏經，No. 2174A (Tai-shō Dai-zōkyō 55, Mokuroku-Bu), pp. 1108-1111。
- (15) 清王士禎居易錄(共34卷，作於康熙28年及40年之間)，卷34，漁洋山人著述，康熙年刻。
- (16) 清阮葵生茶餘客話，卷6，藝海珠塵(吳省蘭輯)土集。
- (17) 葉德輝書林清話，卷1，“書有刻板之始”，1911年出版。
- (18) T. F. Carter, *The Invention of Printing in China*, Revised by L. Carrington Goodrich, 1955, p. 61。
- (19) 宋葉真愛日齋叢鈔，卷1，守山閣叢書，子集。
- (20) 清黃虞稷千頃堂書目(共32卷)，卷12，頁35，適園叢書第2輯。
- (21) 宋葉夢得石林燕語(共10卷)，卷8，石林遺書，清宣統三年葉德輝輯。
- (22) 元馬端臨文獻通考，卷174，“經籍考”，商務印書館萬有文庫本，民25。
- (23) 明陸深金臺紀聞，說郛續編第12。

- (24) 明胡應麟少室山房筆叢，卷4，甲部“經籍會同”四，廣雅叢書18集，光緒22年。
- (25) 清陳元龍格致鏡原，卷39，“文具類三”。
- (26) 清張澍蜀典，卷5，故事類，“蜀中鏤書”條，成都尊經書院板，光緒丙子(1876)刊本。
- (27) Translations by Meadows, *Miscellanies of the Philobiblon Society*, Vol. 6, p. 15, 1858。
- (28) Arthur Waley, “Note on the Invention of Woodcuts”, *New China Review*, 1919, p. 414。
- (29) T. F. Carter, *The Invention of Printing in China*, 1931, Chap. 8, p. 44; and Notes, p. 210。
- (30) 宋朱翌猗覺寮雜記(計上下兩卷)卷下，武英殿聚珍板叢書，乾隆39年(1774)用木刻單字印，光緒25年廣雅書局重刊成。
- (31) 宋王應麟困學紀聞，卷8，“古未有板本”條，四部叢刊三編，子部。
- (32) 趙士埈輯宋國史藝文志輯本(二卷)，趙士埈序，古輯書錄叢輯之五，國立北平圖書館中華圖書館協會合刊，民21年。
- (33) 明張燧，千百年眼(共12卷，有萬曆甲寅-1614-小引)，卷9，“板本之始”。
- (34) 明焦竑，焦氏筆乘(共6卷)續集(共8卷)，卷3，“板本之始”，粵雅堂叢書(咸豐3年伍崇曜序)。
- (35) 清朱彝尊，經義考(共300卷)，卷293，“鏤板”，四部備要。
- (36) 同上註(18)，p. 64, “Notes” 12。
- (37) Aurel Stein, *Ruins of Desert Cathay* Vol. II, 1912, p. 189; 又向達譯斯坦因西域考古記，民24，頁150。
- (38) Lionel Giles, “Dated Chinese Manuscripts in Stein Collection”, *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Studies* (University of London), Vol IX, 1937-39, pp. 1030-1033。
- (39) 同上註(37)，pp. 1033-1034。
- (40) 張秀民，中國印刷術的發明及其影響，1958，頁63及附圖14。

THE PRINTING OF BOOKS IN THE LATER HALF OF THE T'ANG DYNASTY

(Summary)

LI SHU-HUA

It seems that the printing of books has existed in *China* since the first half of the *T'ang* Dynasty. During the later half of *T'ang*, particularly in the 9th century, block printing progressed rapidly. Not only we find many a mention of block printing in Chinese literature of this period, but also the oldest extant printed books of the **Diamond Sūtra** of 868, the oldest calendar assigned to 877, and the dated *Fan Shang's* family calendar of 882, were found at *Tun-huang*. In addition, printed charm was also discovered in a *T'ang* tomb in *Chêng-tu* in 1953.

In the present article, I have reviewed and discussed these historical evidences as well as the archaeological discoveries in detail. We find that in the later half of the *T'ang* Dynasty, printing books consisted of the calendar, the **T'ang-Yün** (唐韻), the **Yü-p'ien** (玉篇), the **Hsiao-hsüeh** (小學), the Buddhist **Diamond Sūtra** and Charm, certain writings related to the Taoism, etc. The large territorial extent to which the advance of printing was mentioned included present provinces of *Szech'uan*, *Kiangsu*, *Anhwei*, *Kiangsi*, *Hunan*, and *Honan*. From these facts we can conclude that printing spread throughout the major part of China during that period.



A

辨多羅三藏三善提心者於一切法處
 知如是見如是信解不生法相須善提所言
 相者如來說即非法相是名法相
 須善提若有人以滿無量阿僧祇世界七寶持
 用布施若有善男子善女人發善薩心者持於
 此經乃至四句偈等受持讀誦為人演說其
 福勝彼云何為人演說下取於相如不動何
 以故
 一切有為法 如夢幻泡影 如露亦如電 應作如是觀
 佛說是經已長老須善提及諸比丘比丘尼優
 婆塞優婆夷一切世間天人阿羅漢聞佛所說
 皆大歡喜信受奉行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
 夏音
 耶婆訶 跋帝 鉢羅若 鉢羅蜜多訶
 唵 伊呬帝 伊失哩 式囉馱 毗舍耶 毗舍耶
 波凌訶
 咸通九年四月十五日王玠為
 二親敬造善施

B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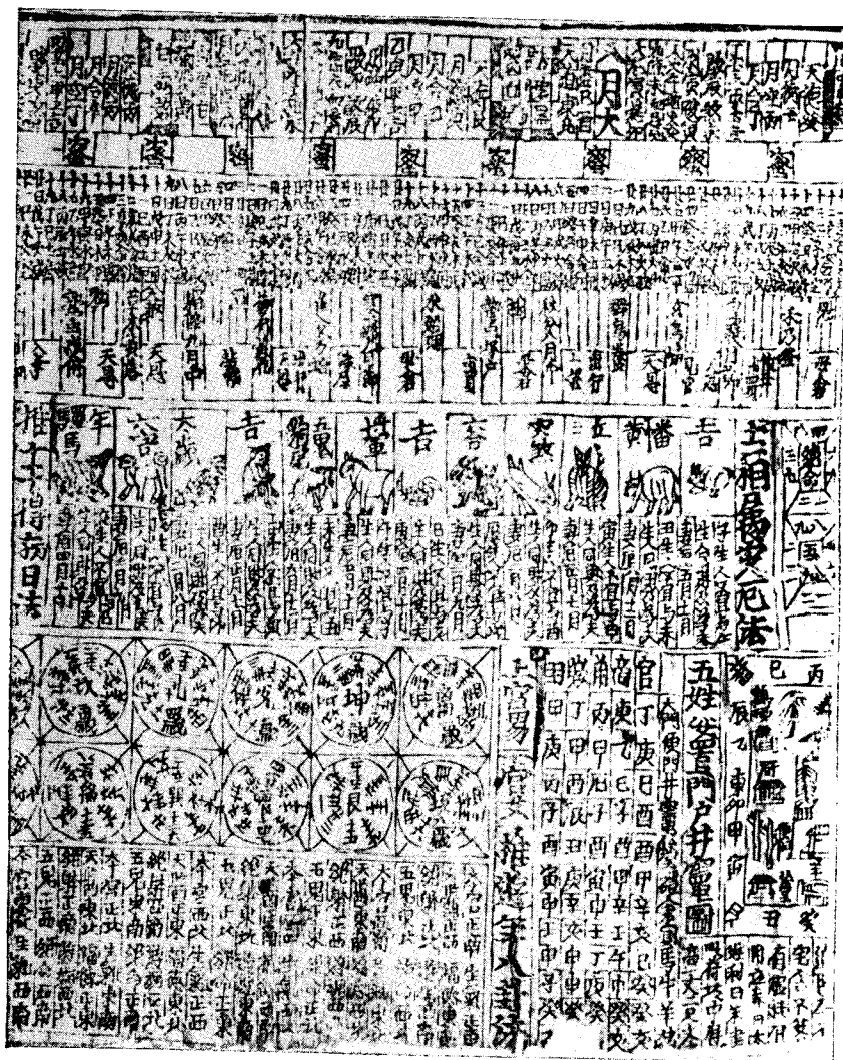
第一圖

唐咸通九年刊印金剛經（西元 868）

（現存世界刊有年代最古的雕板印本書）

A：首頁之雕板印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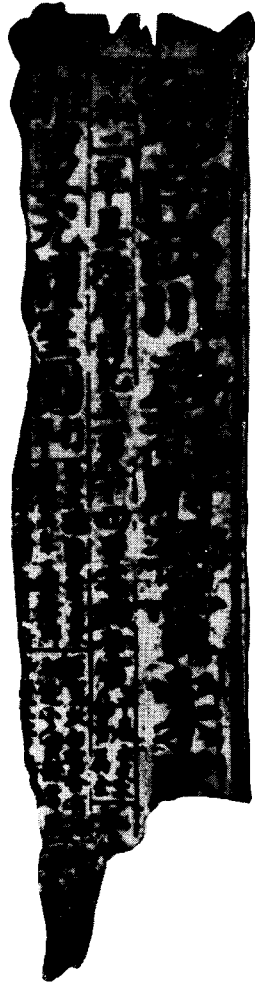
B：末頁之板印文字



第二圖

唐乾符四年印曆之一頁（西元 887）

（現存世界最古的印本曆書）



第三圖

唐中和二年樊賞家曆印本殘頁
(西元 882)



第四圖
成都卜家印陀羅尼經
(成都東門外唐墓出土)